

中國文學史



国学大师以死者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学

钱穆 讲述

叶龙 记录整理



中國文學史

国学大师以死者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学

钱穆 讲述 叶龙 记录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史 / 钱穆讲授 ; 叶龙整理记录. —2 版.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6.1 (2016年重印)

ISBN 978-7-5455-1749-1

I. ①中… II. ①钱… ②叶… III. ①中国文学—文
学史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6901 号

中国文学史

讲 授 钱 穆
记录整理 叶 龙
责任编辑 李晓娟 杨永龙
篇章题字 高运刚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电脑制作 尚上文化
责任印制 李 昆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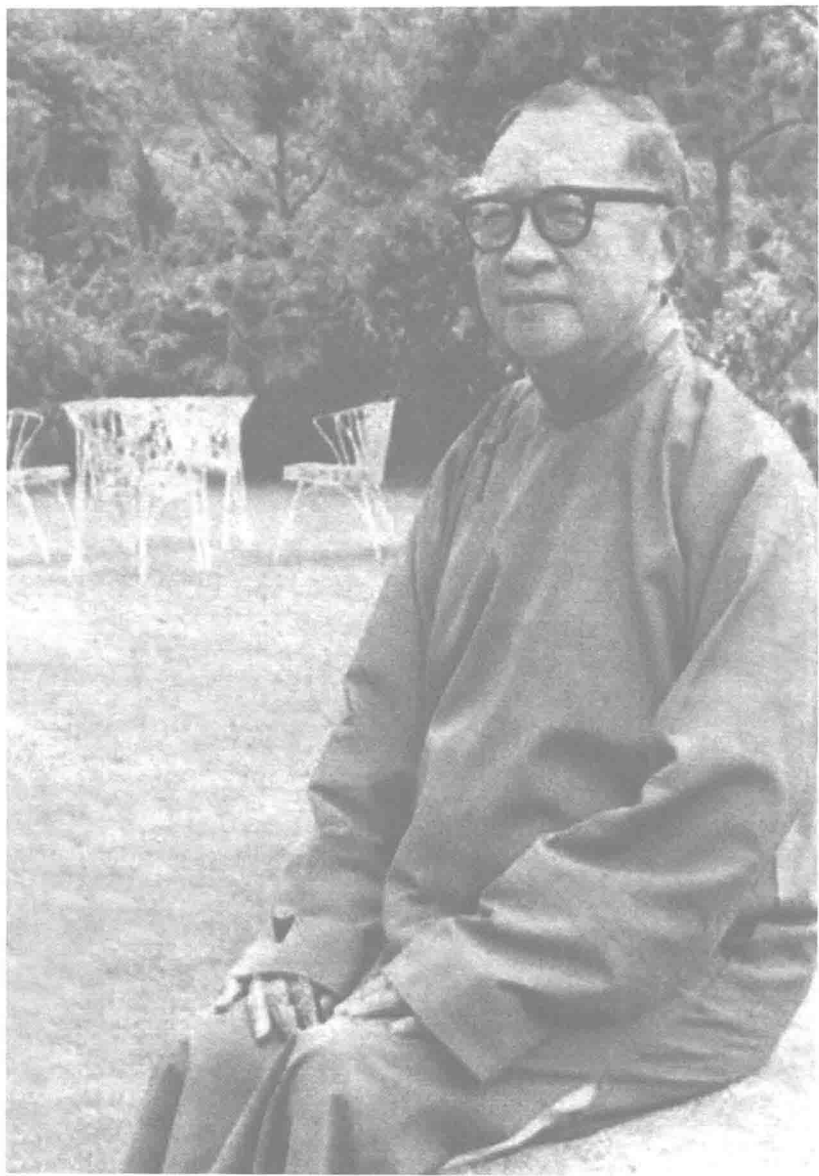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成品尺寸 660mm×92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213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1749-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2522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钱先生个子不高，风度儒雅，望之俨然，
而即之也温（新亚师友/供图）



1954年6月，钱穆与新亚书院同伴（左起：沈燕谋、钱穆、郎家恒、唐君毅）合影（新亚师友/供图）

1955年，钱穆与新亚书院第四届毕业生合影（新亚师友/供图）





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讲课（新亚师友/供图）

钱穆先生在新亚联欢会上表演（新亚师友/供图）





钱穆伉俪在台北素书楼前（新亚师友/供图）



钱穆与侄钱伟长合影
（新亚师友/供图）



1984年，钱穆与子女在新
亚书院散步
（新亚师友/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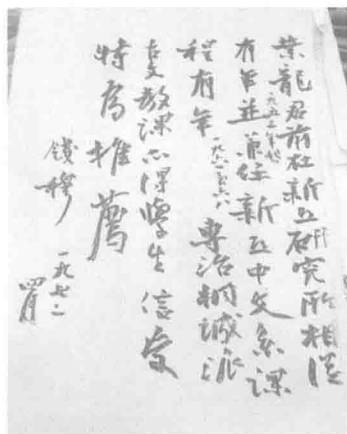
钱穆在台湾最后一次讲课（新亚师友/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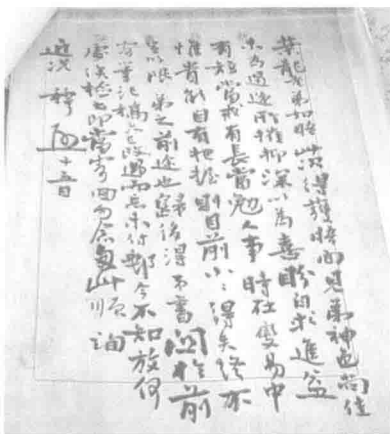
钱穆手书对联：水到渠成看道力，崖枯木落见天心（新亚师友/供图）



1990年7月30日，钱穆与叶龙于台北素书楼合影。拍完这张照片不到一个月，钱穆去世（叶龙/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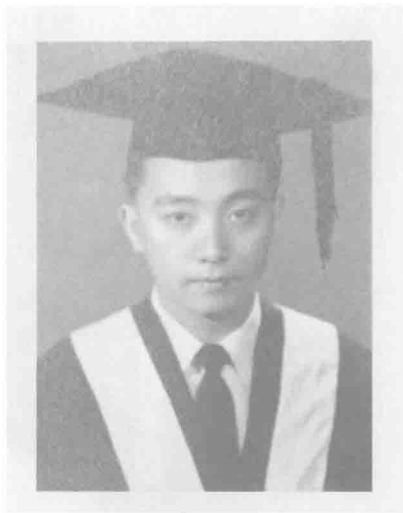
钱穆亲笔推荐信
（叶龙/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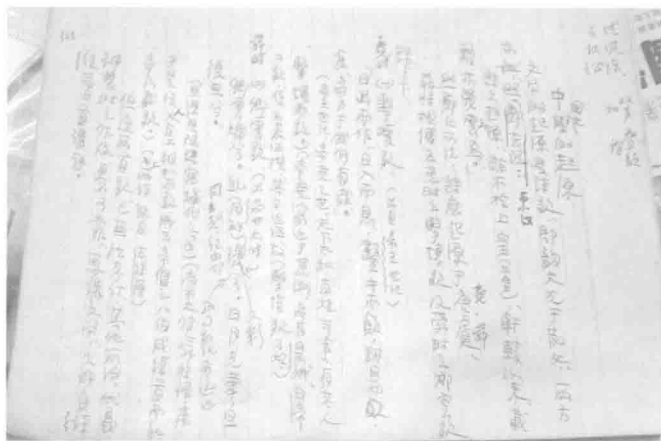
钱穆写给叶龙的信
（叶龙/供图）



叶龙，1928年生。现居香港。
图为年轻时候的叶龙先生
(叶龙/供图)



叶龙毕业照 (叶龙/供图)



叶龙60年前的笔记本，图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章
(叶龙/供图)



香港美国新闻处举办“论世界和平”征文比赛，图为柯约瑟处长（中）与获奖者。右为学生组，左为成人组。左二亚军黄开华，左三冠军叶龙，均为新亚书院学生（叶龙/供图）



1956年，香港美国新闻处为纪念威尔逊总统诞辰一百周年举办征文比赛，叶龙获成人组冠军。图为新闻处长柯约瑟为叶龙颁奖（叶龙/供图）

序 一

骆玉明

在老一辈学术名家中，钱穆先生以学问淹博、著述宏富著称。不过，他对古代文学这一块说得不多。《钱宾四先生全集》凡五十四册，谈中国古今文学的文章都收在第四十五册《中国文学论丛》中，占全集的比例甚小。这些文章论题相当分散，一般篇幅也不大，只有《中国文学史概观》一篇，略为完整而系统。因此，如今有叶龙先生将钱穆先生1955至1956年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中国文学史”的课堂笔录整理成书，公之于众，实是一件可以庆幸的事情。钱先生是大学者，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学术的一个以前我们知之不多的方面；而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来说，更能够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

从前老先生上课大多自由无羁。我曾听说蒋天枢先生讲第一段文学史唐以前¹，学期终了，《楚辞》还没有讲完。钱穆先

1 编者按：内文红色楷体部分的解释，均为原文作者所加。以下同。

生的文学史分成三十一篇，从文学起源讲到明清章回小说，结构是相当完整的了。不过讲课还是跟著述不一样，各篇之间，简单的可以是寥寥数语，详尽的可以是细细考论，对均衡是不甚讲究的。而作为学生的课堂笔记，误听啊漏记啊也总是难免。要是拿专著的标准来度量，会觉得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

但笔录也自有笔录的好处。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些“奇谈妙论”，见性情而有趣味。若是作文章，就算写出来也会被删掉。譬如钱先生说孔子之伟大，“正如同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这话简单好懂容易记，却又是特别中肯。盖孔子最要讲的是一个“诚”，连说话太利索他都觉得可疑。“百货公司，货真价实”不好用作学术评价，但学生若是有悟性，从中可以体会出许多东西。而现在我们作为文本来读，会心处，仍可听到声音的亲切。

要说文学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我们知道它是起于西洋；而最早的中国文学史，也不是中国人写的。但绝不能够说，中国人的文学史意识是由外人灌输的。事实上，中国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学现象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至少在南朝，如《诗品》讨论五言诗的源流，《文心雕龙》讨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都有很强烈的文学史意识；至若沈约写《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写《南齐书·文学传论》，也同样关注了这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出色的见解。中国文学有自己的道路，中

国古贤对文学的价值有自己的看法。而在我看来,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既认识到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特质,同时又深刻地关注中国传统上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意识。在众多重大问题上,钱先生都避免用西方传统的尺度来衡量和阐释中国文学现象,而尽可能从文化机制的不同来比较中西文学的差异,使人们对中国文学的特点有更清楚的认识。也许,我们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与钱先生有所不同,但他提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却是有普遍意义的——这还不仅仅由文学而言。

钱先生是一个朴实而清晰的人,他做学问往往能够简单直截地抓住要害,不需要做多少细琐的考论。譬如关于中国古代神话,中日一些学者发表过各种各样的见解。有的说因为中国古代人生活环境艰苦,不善于幻想,所以神话不发达;有的说因为中国神话融入了历史传说,所以神话色彩被冲淡了,等等。但这样说其实都忽略了原生态的神话和文学化的神话不是同样的东西。前些年我写《简明中国文学史》,提出要注意两者的区别,认为中国古代神话没有发展为文学,而这是受更大文化条件制约的结果。我自己觉得在这里颇有心得。但这次看钱先生的文学史,发现他早已说得很清楚了:

至于神话、故事则是任何地方都有的产物。中国古代已有,但早前未有形成文学而已。在西方则由神话、故事而有文学。中国

之所以当时没有形成文学，是由于文化背景之有所不同所致，吾人不能用批评，只宜从历史、文化中去找答案，才能说明中西为何有异。

我们都知道钱先生是一位尊重儒家思想传统的学者。儒家对文学价值的看法，是重视它的社会功用，要求文学有益于政治和世道人心，而钱先生是认同这一原则的。所以，在文学成就的评价上，他认为杜甫高于李白，陶渊明高于谢灵运，诸如此类。站在儒者的文学立场上，这样看很自然，也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与此同时，令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钱先生对文学情趣的重视和敏感。他说：

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是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自然地，雄鸟鸣声向雌鸟求爱固然是出于求爱，但晨鸟在一无用心时鸣唱几声，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什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而开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可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

这些议论使人感到，钱穆先生对文学的理解，有其非常重视美感的一面。他特别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就是因为它轻

快自如，毫不做作这和鲁迅一致。而且在钱先生看来，正是由于曹操文学的这一特点，他在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钱先生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

钱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赋比兴，有不同寻常的理解，这和他重视文学情趣的态度也是有关的。他引宋人李仲蒙解释赋比兴之说，归结其意，谓：“意即无论是赋，是比，或是兴，均有‘物’与‘情’两字。”然后发挥道：

俗语说：“万物一体。”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学家都曾讲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在思想史中却是无法找到这理论的。我们任意举两句诗，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当我人沉浸在此种情调中时，不能说是写实文学，因为它不限时、地、人；也不能说其浪漫；且狗吠鸡鸣亦非泛神思想，亦非唯物观，此乃人生在大自然中之融洽与合一，是赋，对人生感觉到有生意有兴象之味，犹如得到生命一般。

赋比兴都是追求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这个说法以前是没有的。但确实，我们在读这些文字时会感到一种欣喜，我们会感到自己对诗歌有了更亲切的理解。

从历史与社会来说文学，从文化环境说文学，从中西比较

说文学，这是钱穆先生《中国文学史》眼界开阔、立论宏大的一面；从自由洒脱、轻盈空灵的个性表现说文学，从心物一体、生命与大自然相融的快乐说文学，这是钱穆先生《中国文学史》偏爱性灵、推崇趣味的一面。两者不可偏废。

至于钱先生讲课一开始就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这倒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感慨和惊奇的。以中国文学历史之悠久、作品数量之庞大、文学现象之复杂，文学史写作几乎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至于“理想”的文学史，只能是不断追求的目标吧。

骆玉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